

金中樞◎著

宋代的學術

私制度研究(一)

宋代學術思想研究

金中樞◎著

宋代的學術

和制度研究(一)

宋代學術思想研究

國家圖書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宋代的學術和制度研究 / 金中樞著. -- 初版. -- 臺北縣板橋市：稻鄉，民 98.06

冊：公分

ISBN：978-986-6913-50-1（全套：精裝）

1. 中國政治制度 2. 官制 3. 學術思想 4. 宋代

573.151

98008890

宋代的學術和制度研究（一）

宋代學術思想研究

著者：金中樞

出版：稻鄉出版社

台北縣板橋市漢生東路 53 巷 28 號

電話：(02) 22566844、22514894

傳真：(02) 22564690

郵撥帳號：1204048-1

登記號：局版台業字第四一四九號

<http://dawshiang.myweb.hinet.net>

印刷：縉億印刷有限公司

定價：新台幣 5000 元（全套精裝，不分售）

初版：中華民國 98 年 6 月

ISBN：978-986-6913-50-1

※破損頁或缺頁請寄回本社更換※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緒論

余承幼獅文化事業公司出版《宋代學術思想研究》一書，今將其重行調整，依論文體系而損益之。其緒論，亦當刪增舊說，而加以更改。宋代的學術思想，自國初以來，即沿著兩條路線發展：一條是撥棄傳注而提倡經義，另一條是撥棄時文（駢文）而提倡古文。先從科舉考試來論證，此拙著《北宋科舉制度研究》裏說過：「國初諸儒以經術行義聞者，但守傳注，以篤厚謹。……至真宗咸平五年，洛陽節度判官張知白深以此爲不是，乃上疏難之，……不徒說明當時之風尚與弊害，而此後各科試藝、習業之重心，蓋亦循之轉變。……自咸平、景德以後，（一）關於習業者，由重經、史、子、集而趨於重經、史，而習經亦由重注疏而趨於重大義。（二）關於試藝者，由重詩、賦而趨於重論、策，而試文亦由重聲律而趨於重治道。」再具體言之：「景德二年，……試進士，題爲〈當仁不讓於師〉，不取賈邊『解師爲眾』之新說，猶仍以注疏爲本。……迨『孫明復爲《春秋尊王發微》，稍自出己意，』遂開以意說經

之端。……劉敞『《七經小傳》』出，……稍尙新奇。……而科場以意說經之風，遂不可抑止。……此不僅考生如此，其時朝廷詔令，考官問目，亦莫不以是爲準則。宋王珪所謂『悉以明六經大法之歸，固不專于記誦之功』者，此也。……故陸游曰：『唐及國初，學者不敢議孔安國、鄭康成，況聖人乎！自慶曆後，諸儒發明經旨，非前人所及，然排《繫辭》，毀《周禮》，疑《孟子》，譏《書》之《胤征》、《顧命》，黜《詩》之《序》，不難於議經，況傳注乎！』……『案宋儒撥棄傳注，遂不難於議經。排《繫辭》謂歐陽修，毀《周禮》謂修與蘇軾、蘇轍，疑《孟子》謂李覯、司馬光，譏《書》謂蘇軾，黜《詩序》謂晁說之。此皆慶曆稍後人，可見其時風氣使然。』……則熙寧王氏父子著《三經新義》以取士，又何怪焉！……此所謂『事欲求成，亦必歷更而後盡其變也。』（註一）準是以觀，知當時朝野雙方大都撥棄傳注和時文（駢文），而提倡經義和古文了；可見這兩條路線之發展，是當時學術思想的必然趨勢。

今拙著《宋代的經學當代化初探》，〈初探續上、下〉，〈初探再續上、下〉，及〈初探三續〉，即其第一路線的論證——撥棄傳注而提倡經義。自《聶崇義的三禮圖學》，至《賈子明（昌朝）的經學》，共論二十餘家，都是撥棄傳注，而提倡經義的人，足證它的發展，的確是一條康莊大道。

此下《宋代古文運動之發展研究》，即其第二路線的論證——撥棄時文（駢文）而提倡古文。

就這一方而言，即上述「撥棄傳注而提倡經義」一線索，初亦得自此說。它經過以下諸進程：一、柳仲塗等於宋初承五季駢文取士時期之古文運動，二、穆伯長等於景德以後西崑時文取士時期之古文運

動，三、石守道與景祐以後之古文變體，四、歐陽文忠與慶曆以後之古文運動，五、餘論。此五進程中，其四進程有云：「歐公論文，一本韓公，而並亦與理學家相近，……從事古文運動，或可謂爲折衷『時』、『變』二體之運動。故廬陵劉性序〈宛陵先生年譜〉云：『宋嘉祐二年，詔修取士法，務求平澹典要之文，文忠公知貢舉，而先生爲試官，於是得人之盛，若眉山蘇氏、南豐曾氏、橫渠張氏、河南程氏皆出乎其間，不惟文章復乎古作，而道學之傳上承孔孟。』……其實梅聖俞早與李泰伯從事於古文矣；……『慶曆間，……胡翼之、孫明復、石徂徠以經術來居太學，而李泰伯、梅聖俞輩又以文墨議論游泳於其中。』……聖俞對於詩之復古，爲功尤大。而蘇曾諸氏又皆先後爲歐公門下士，……曾氏實爲之冠。……又《史》稱：『王安石、介甫，……爲文動筆如飛，』……『友生曾携以示歐陽修，修爲之延譽，擢進士上第。』……此慶曆二年事也。故臨川王氏尤先蘇氏而爲歐公之門人。此子瞻所謂『長育成就，至嘉祐末，號稱多士』者也。……『自是臨川以王氏爲宗，南豐以曾氏爲重，眉山以蘇氏爲師。』……『一代之彌文，郁郁乎不可尙已。』……古文運動，至此告成。」

上述「餘論」，即論證古文道學化。這樣說來，亦足見此一路線之發展，也的確是一條康莊大道。何況古文是「文以載道」、「文以明道」和「文以行道」，而六經都是載道、明道和行道的書，則此兩條路線之發展，應可殊途而同歸；然欲開創新說，其轉關必有賴於大儒了。同時，上述張用晦嘗云：「今夫師異道，人異論，百家殊方，指意不同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，……下不知所守，……亂皇王之大

道也。」(註二)這是宋朝士大夫，在學術上正式要求統一，而提倡「春秋大一統」(同上)的開端；其目的則在「尊王」與「明道」，而為當代學術的兩骨幹。故「昌言師道，確立道統」，尤非大儒不為功。是則從當時學術環境來衡量，當首推胡瑗其人。

胡瑗字翼之，世稱「安定先生」，所以接著就是〈宋代學術發展之轉關——胡安定〉一文。此主要根據他的《周易口義》來闡發，以尋其對宋代學術發展的轉關作用云。

他的「轉關作用」，即在其「推陳出新」。如前所述，在他之先，經過許多學人努力奮鬥，一方面「撥棄傳注而提倡經義」，另一方面「撥棄時文(駢文)而提倡古文」，雙管齊下，並對釋老二氏思想加以批評，而鋪平了轉關的大道。等到安定出來，「昌言師道，確立道統」，纔正式轉關。

先就一般文獻及與胡氏有關人員來分析，即「從撥棄文辭而提倡體用之學」，與「從體用之學而開創理學之端」。故黃東發說：「本朝理學，雖至伊洛而精，實自先生而始。」

其次，就胡氏專著及與胡著有關係著述來分析：其說《易》以「義理為宗」，說《洪範》惟發明「天人合一」之旨，故他的著述，可以三言概括：(一)撥注疏之非，(二)發經學之覆，(三)開理學之端。

最後，可歸納為兩要點，即「從天地之道到君臣之道」，與「從聖賢之性到常人之性」。特安定說：「天地元善之氣，受之於人，皆有善性，」實開當時小程子言「氣質之性」的先聲。

同為學術開創新說及其轉關的大儒，則為孫復其人了。孫復字明復，世稱「泰山先生」，所以接著

又是〈孫泰山的經學初探——春秋學舉例〉一文。他所著《春秋尊王發微》，也是「宋代學術發展之轉關」一書。歐陽修說：「先生治春秋，不惑傳注，不爲曲說以亂經。其言簡易，明於諸侯、大夫功罪，以考時之盛衰，而推見王道之治亂，得於經之本義爲多。」「這是一部由經學轉到史學來的書，接著就是歐陽修的《五代史》。」

黃東發又說：「……宋興八十年，安定胡先生，泰山孫先生，徂徠石先生，始以其學教授，而安定之徒最盛。」因而又作〈石徂徠研究〉，從《徂徠集》和《春秋說》等專著探索。他喜古文道學化，常以經學教授於家及太學；故太學之興，自徂徠始。他生平依經而行。其經學即在當代化。其〈聖德頌〉即本經義。其斥佛、老、時文，而行仁義，無一不是本著經學立場而發揮的。故他不止是一位善人、賢人，也是一位古文家、教育家，更是一位經學當代化的經學家，且是德、道、節都有足邵的儒家了。

其〈研究續〉，仍沿上述琢磨，根據資料分析，而作「經學的通釋」、「醇儒的經學」及「經學的體用」三方面闡明。

其〈研究再續、三續〉，則專門試釋他的《春秋說》，經縝密考證，不惟信而有徵，尤甚具卓見，於經學貢獻良多，一若上云，誠一「經學當代化的經學家」也。

而李觀、泰伯，如上所云，「早從事於古文矣，」是真宗大中祥符二（一〇〇九）年到仁宗嘉祐四（一〇五九）年時代的人，正是前述兩條路線發展的中堅分子，經學其尤者焉。

他的〈經學〉，是講「明體達用」的，「經義其體，時務其用，」一言以蔽之，要將經學當代化，而反對漢唐以來的注疏。

其〈禮論〉，是站在儒家立場，推行以禮治天下，即禮治主義。禮的定義即法制，禮的本原即情、性和聖人之言，禮的支柱即樂、政、刑，禮的旨意即仁、義、智、信；並說明禮與樂、政、刑和仁、義、智、信的興革及相互關係，然而他偏重荀卿，似乎以儒為主、法為輔的政論家；且反對一切非禮的措施，卻又是道地儒家了。

以上所說的轉變之迹，一脈相承，故命名《宋代學術思想研究》。

附註：

- 註一：據第二節「各科試藝、習業之重心轉變」，載香港新亞研究所《新亞學報》第六卷第一期，頁二二九、三三五，及頁二三〇—二三三；並見《宋史研究集》第十一輯，頁一九、二六及頁二〇—二三。
- 註二：詳李焘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卷五三真宗咸平五年十一月庚申，頁九—一三。

目次

緒論	一
一、宋代的經學當代化初探——聶崇義的三禮圖學	一
二、宋代的經學當代化初探續（上）——王昭素、柳仲塗、胡周父、 （附）黃敏求等的經學	四一
三、宋代的經學當代化初探續（下）——崔頤正、邢叔明、（附）杜文 周、孫宗古、馮道宗等的經學	六三
四、宋代的經學當代化初探再續（上）——种明逸、穆伯長、李挺 之、黃景微等的經學	八九

五、宋代的經學當代化初探再續（下）——王聖源、宋貫之、何濟川、周子餘、龍起之等的經學	· · · · · ·	一一九
六、宋代的經學當代化初探三續——賈子明的經學	· · · · · ·	一四七
七、宋代古文運動之發展研究	· · · · · ·	一八九
八、宋代學術發展之轉關（註一）——胡安定	· · · · · ·	二六一
九、附錄節本	· · · · · ·	三七四
一〇、孫泰山的經學初探——春秋學舉例	· · · · · ·	四四三
一一、石徂徠研究	· · · · · ·	五一九
一二、石徂徠研究續	· · · · · ·	五五七
一三、石徂徠研究再續	· · · · · ·	六〇一
一四、石徂徠研究三續	· · · · · ·	六三五
一五、李靚的經學初探	· · · · · ·	六八三

一六、李泰伯的禮論 · · · · · 七〇九

目次

3

宋代的經學當代化初探——聶崇義的三禮圖學

提 要

宋代的經學當代化，就是經學之變古。此當趙宋開國之初，甚至在她以前，已經萌芽，聶崇義即其代表人物。他博采先儒《三禮圖》，凡得鄭玄等六家。他據此六家所采的古典，也就是經義；不合乎經義的，就以理論合事實裁定之。禮其本也，圖其末也。「惟聖人務其本以求理，存其末以致用，故能通天下之變，而至於道也。」它的內容，自冕服圖至目錄，一共二十篇，謂之《新定三禮圖》；行世之後，一方面廣被採用，另一方面則廣受批評，然宋史將他列諸儒林之首，可謂極儒生稽古之榮了。禮圖之近乎古者，莫過於這部書。若拿理學家的觀點來衡量，則猶以為不及。故宋代經學之變古，即經學當代化，雖一器之微，亦必返斯世於三代，以跨駕漢唐。此亦見經學與理學之所由分了。

宋代的經學當代化初探——聶崇義的三禮圖學

目次

- (一)
(二)
(三)
(四)
(五)

(一)

宋代的經學當代化，就是經學之變古。此當趙宋開國之初，甚至在她以前，已經萌芽，聶崇義即其代表人物。《宋史》卷四三一〈儒林傳、聶崇義傳〉云：

聶崇義河南洛陽人，少舉三禮，善禮學，通經旨。漢乾祐中，累官至國子禮記博士，校定公羊春秋，刊板于國學。周顯德中，累遷國子司業、兼太常博士。先是世宗以郊廟祭器……無所規式，乃命崇義檢討摹畫以聞。……未幾，世宗詔崇義參定郊廟器玉，又詔翰林學士竇儼統領之，崇義因取《三禮圖》再加考正，建隆三年四月表上之，儼為序，太祖覽而嘉之。詔曰：「禮器禮圖，相承傳用，寢歷年祀，寧免差違，聶崇義興事國庠，服膺儒業，計尋故實，刊正疑訛，奉職效官，有足嘉者，崇義宜量與酬獎，所進《三禮圖》，宜令太子詹事尹拙集儒學三五人，更同參議，所冀精詳，苟有異同，善為商確。」五月，賜崇義紫袍、犀帶、銀器、繪帛以獎之。拙多所駁正，崇義復引經以釋之，悉以下工部尚書竇儀，俾之裁定。儀上奏曰：「伏以聖人制禮，垂之無窮，儒者據經，所傳或異，年祀寢遠，圖繪缺然，躋駁彌深，丹青靡據。聶崇義研求師說，耽味禮經，較於舊圖，良有新意。尹拙爰承制旨，能罄所聞。尹拙駁議及聶崇義答義各四

卷，臣再加詳閱，隨而裁置，率用增損，列於注釋，共分為十五卷以聞。」詔頒行之。拙、崇義復陳祭玉鼎釜異同之說，詔下中書省集議。吏部尚書張昭等奏議曰：「按聶崇義……別作畫圖，違經立異……順非改非，於理未通。又據尹拙所述……梁桂州刺史崔靈恩所撰《三禮義宗》，……則靈恩議論，理未為失。所以自《義宗》之出，歷梁、陳、隋、唐，垂四百年，言禮者引為師法。……近代晉、漢兩朝，仍依舊制。……自唐貞觀之後，凡三次大修五禮，並因隋朝典故，或節奏繁簡之間，稍有釐革，亦無改祭玉之說。伏望依《白虎通》、《義宗》、《唐禮》之制，以為定式。又尹拙依舊圖畫釜，聶崇義去釜畫鑊，臣等參詳舊圖，皆有釜無鑊。……今崇義以周官祭祀有省鼎鑊、供鼎鑊，又以儀禮有羊鑊、豕鑊之文，乃云畫釜不如畫鑊。今諸經皆載釜之用，誠不可去，又周《儀禮》皆有鑊之文，請兩圖之。又若觀諸家祭祀之畫，今代見行之禮，於大祀前一日，光祿卿省視鼎鑊，伏請圖鑊於鼎下。」詔從之。未幾，崇義卒，三禮圖遂行於世，並畫於國子監講堂之壁。崇義為學官、兼掌禮，僅二十年，世推其該博。……

這裡一則說：「聶崇義善禮學，通經旨，累官至國子《禮記》博士，校定《公羊春秋》。」（註一）再則說：「崇義興事國庠，服膺儒業。」三則說：「崇義所進《三禮圖》，令太子詹事尹拙集儒學三、五人參議；拙多所駁正，崇義復引經以釋之。」換句話說，他是純儒，但不重視注疏之學。這是他改變了

漢唐以來經學家的觀點，而開創「變古」之風。當時的工部尚書竇儀是推服聶氏的，也站在重經義的立場。故這裡稱他上奏說：「聖人制禮，垂之無窮。儒者據經，所傳或異。聶崇義研求師說，耽味禮經，較於舊圖，良有新意。」而同時的吏部尚書張昭等則立於反對立場，是偏重注疏的。故這裡載他們的奏議則說：「按聶崇義別作畫圖，違經立異。順非改非，於理未通。伏望依白虎通、義宗、唐禮之制，以爲定式。」前者是追求上古三代的理想，而實爲開新。後者是因循漢唐以來的現實，而實爲守舊。這裡所載張昭等奏議又說：「尹拙依舊圖畫釜，聶崇義去釜畫鑊，臣等參詳舊圖，皆有釜無鑊。今諸經皆載釜之用，誠不可去；又周《儀禮》皆有鑊之文，請兩圖之。若觀諸家祭祀之畫，今代見行之禮，於大祀前一日，光祿卿省視鼎鑊，伏請圖鑊於鼎下。」此從表面上看來，好像是不偏不倚，略爲推敲，實在是偏袒守舊的。幸當時「詔翰林學士竇儼統領之」，他也是一位反對守舊的人，而推服聶氏之開新。（新定三禮圖序），就是他寫的，下面還要引它來證明。現在首先要考正的，據《長編》建隆二年五月條：初，周世宗命國子司業、兼太常博士洛陽聶崇義詳定郊廟器玉，崇義因取《三禮舊圖》，考正同異，別爲新圖二十卷，丙寅來上，詔加褒賞，仍命太子詹事汝陰尹拙集儒臣參議。拙多所駁難，崇義復引經解釋，乃悉以下工部尚書竇儀裁處至當，然後頒行。」《崇文總目》和《玉海》均同此說。《經義考》據《崇文總目》。今存錢輯《崇文總目》則又據《經義考》。（註二）《資治通鑑》本《長編》，差不多完全登載了此引原文（註三）。則此謂「建隆三年四月表上之」，當然是錯了。且據崇義自序，即「新定三禮圖、